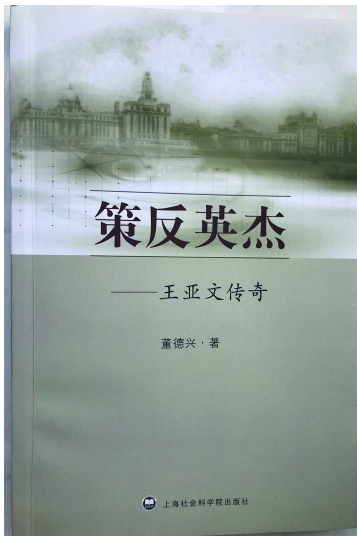


# 王亚文：战斗在黎明前的十里洋场

王冷一



《徜徉在史学与文学之间》  
张广智 著  
商务印书馆

大浪淘沙尽，岁月如歌还。在纪念上海解放七十周年的日子里，我再次精读了这本惊涛骇浪的《策反英杰——王亚文传奇》。王亚文，湖南醴陵人；一九一零出生于务农世家、为家中次子，因家境相对宽裕而在当地接受了新式的中学基础教育。他的理想本来是个读书人，但乱世总是激荡着他的书桌。他十三岁就参加了安源路矿大罢工，结识了刘少奇和李立三；两年后成为中共党员。他十六岁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与林彪是一个宿舍同学。黄埔期间，他参加了东征和北伐；因英勇战斗、身先士卒被周恩来誉为“小钢炮”。他十七岁，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之后他还考入北京大学并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二十八岁开始，在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领导下，王亚文成为我党隐蔽战线的骨干。

皖南事变的消息，就是由王亚文第一时间传入重庆周公馆的。1941年1月16日，王亚文与几位朋友拜访程潜，正说到兴奋处，蒋介石打来电话。接电话后，程潜神情异样地对在座的人说：“刚才蒋委员长来电话说，新四军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被击毙，要我今晚去开会，明天宣布新四军叛变，取消新四军的番号。”王亚文内心很震惊，瞅准机会借口离开，避开特务耳目，冒险立即由密道进入周公馆，汇报这一重要情况，使得党中央及时作出应对决策。蒋介石独裁政权宣布取缔新四军番号仅三天，延安便下令重建新四军军部，领导新四军坚守长江南北。

1947年3月，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即将进入战略反攻阶段，中共中央军委决策核心就以其前瞻性战略眼光的预见到——“蒋介石必定会在上海这座远东第一大都市孤注一掷”，决定先期选派精干、忠诚的骨干在国民党反动政权驻守于上海的军队中进行策反，使解放上海时发生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在选派骨干人员的讨论中，董必武提议此项任务非王亚文莫属。肩负特殊使命的王亚文，化名张子舒潜入上海。在董必武指示下，由时任华东野战军对敌作战部部长、城市工作部部长沙文汉（后为新中国首任浙江省省长）代表刘伯承和陈毅、粟裕领导王亚文工作，并正式任命王亚文为上海策反工作组组长。由此到1949年5月27日即二十六个月的时间里，王亚文开启了自己一生中最为波澜壮阔的谍海生涯。

这二十六个月时间里的惊心动魄，长期以来并不为人所知；甚至不少专业的党

史工作者和研究人员也是所知甚寡。我是一九八五年从上海延安中学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的，一九八七年上半年两位青年讲师张济顺（后为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和张云（后为上海党史研究会会长、教授），分别给我和同学们讲授中国现代史和中国革命史。他们熟悉的都是解放军三大战役等正面战场，对于上海如何迎接解放主要聚焦在复旦、交大、同济等高校的青年学生运动上。关于隐蔽战线的斗争和革命先驱的大智大勇，我和同学们主要还是通过《永不消失的电波》、《渡江侦察记》、《战上海》等中学时代就已熟悉的经典影片来了解一些皮毛的。毕业于复兴中学的孙崇文和余春雷同学，曾经在主题班会上很自豪地介绍过鲁迅在虹口、红色电波在虹口等上海的往事。余春雷同学的家，就住在鲁迅公园（当时叫虹口公园）对面的黄渡路；她陪我瞻仰过邻居的家——李白烈士的故居，那时这故居还没有向公众开放呢。而另一位上海籍的同学屠宝迪，则明确地告诉过我，和唐朝大诗人同名的李白就是《永不消失的电波》中李侠的原型。

但我在很长的时间里，对王亚文前辈是一无所知的。我听说王老前辈的大名，已经是在上海社科院历史所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了。记得是建党七十周年即一九九一的上半，我当时是社科院研究生的学生会主席，算是进步青年。社科院党委书记严谨、研究生部（现在叫研究生院）主任胡振平研究员和我的导师李华兴教授，都希望我能够在研究生中带头学习中共党史、去了解上海迎接黎明的艰辛岁月、并且参与抢救地下党前辈的口述革命回忆录。我很庄严地投入了这份研究型工作，也一心想整理出一些革命斗争的宝贵史料。经组织安排，我在华东医院见到并采访了陈修良老前辈；她就是沙文汉的夫人！陈修良是一九二五年入党的老同志、她入党介绍人是向警予，她是南京最后一任地下党市委书记、之前的八任书记都牺牲了。我采访时，她的身份是上海社科院党委顾问、正在病榻上奋笔疾书革命回忆录。交流当中，她丝毫不谈自己的惊险往事、哪怕是曾经的出生入死的片断；她主要和我叙述了潘汉年的不朽功绩，还提到了我极为陌生的王亚文先生。陈修良老人家了解到我高中毕业于延安中学、大学毕业于复旦历史系但又第一次听说王亚文的大名之后，很不满意！因为上海解放后，王亚文先生就担任了延安中学（最初叫真如中学）的首任校长；她让我自己去好好了解王先生。

陈修良老人家还希望我把王亚文的上海地下党功绩整理出来，但我没能完成这个很庄严的任务。虽然王亚文先生当时是社科院经济所副所长、研究员，我还从当时社科院副院长夏禹龙先生（也是地下党骨干）那里知道了一些片断；但是在社科院的走廊里，王亚文先生听了我的请求之后只回答了六个字——“现在还不能说”。第二天，夏禹龙先生特地安慰我：到一九九九年上海解放五十周年的时候也就是五十年解密期到了，有些档案就能开放、有些故事就能公开、王亚文先生一定会接受你的专题采访；但是，这年十月的最后一天，王亚文先生去世了。

他带着很多“深海的秘密”和他的忠贞，静静地走了；这让他的同事、战友和党

史专家们深深地惋惜着。又过了十年即上海解放六十周年之际，上海社科院和其它红色基因丰富的单位一样，在市委宣传部和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的鼓励下，积极展开了抢救地下党革命史料的学术工作。如在上海社科院党委书记于信汇教授的关心下，社科院老干部办公室推出了夏禹龙先生的口述回忆录。在这之前，则由作家、社科院文学所的董德兴老师推出了史诗性专著《策反英杰——王亚文传奇》。这不仅是对王亚文最好的纪念，也让我得以知晓那些黎明的幽光！

董德兴在《策反英杰——王亚文传奇》中明确无误地告诉读者：王亚文一到黎明前的上海，就居住和工作在牌号为虹口东体育会路20号的一栋小洋房，这是沙文汉用他岳母的十五根金条买下来从事秘密联络的核心据点。这个时刻，王亚文联络最为关键和频繁的是中共党外干部张权将军（能够接触蒋介石政权核心机密的国民党中中将），王亚文自己则是国民党军的少将。张权的寓所是离东体育会路不远的麦加里（Maijiali）即溧阳路965弄；在天水路、海伦路之间。因一九二零年由麦加利银行兴建而故名，其占地0.4公顷，当时有楼房38幢、居民400余人。目前，弄堂内还有上海总工会秘密机关旧址，为上海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一直到一九四八年冬季，王亚文收集到的很多军事情报，都是他到黄渡路交由李白电台发往淮海战役总前委。而张权则根据中共地下党上海局的要求，利用其国防部中观察员的合法身份到沿江前线“视察”，驱车跑遍了国民党军队在长江的千里防线，在渡江战役之前几乎每个营地、每个炮台都察看了。回到上海后，张权就立马来到东体育会路20号的小洋房阁楼上，与王亚文夫妇一起，三天三夜未合眼，将沿途记录、速画的一大包小纸片一一铺在地板上，由擅长绘图的张端元对照着绘制成一张巨大的《长江沿岸江防图》，连同王亚文从吴石将军那里秘密获得的《国民党国防部全国军备部署图》，一并交给了沙文汉。由于李白电台已经被破坏，沙文汉另行安排地下党的人力交通员迅速送达江北解放军的前敌指挥部，这对解放军胜利渡江、攻打上海和解放全中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现在回想起来，这些关键情节在《渡江侦察记》拍摄之际都是无法公开的机密。所以，影片中只能是解放军派侦察战斗小分队、在江南游击队的配合下，获取了国民党军队的江防沿线第一手情报，再由战斗英雄泅渡过江交给前敌指挥部。

除了军事情报的收集、绘制和传递，更惊心动魄的就是从敌人内部和最关键岗位策反对方、瓦解对方。《策反英杰——王亚文传奇》中就这样记载：一九四九年二月王亚文与周应聪（公开身份是国民党海军参谋长、少将），成功策反国民党海军主力军舰“重庆号”巡洋舰舰长邓兆祥率舰起义。王与周，两人在上海地下党的身份分别是起义海军政委和司令。邓兆祥出生于广东省高要县，一九三零年赴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英国海军鱼雷学校深造，他刻苦钻研、成绩优异，熟练掌握了鱼雷、航海、信号、舰炮等专业核心业务，归国后即有“英国海军通”的美誉。他参加了抗日战

争的对日海战，痛恨国民党发动内战以及四大家族的无耻行径。在起义的前一天，邓兆祥接到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的命令即率舰赴江阴要塞、阻挡解放军渡江！二月二十四日子夜，在上海地下党的积极支持下，邓兆祥和王亚文事先精心组织的“士兵解放委员会”骨干把数十名态度暧昧的官兵悄悄缴械，一瞬间全舰就全部掌握在起义者手中。二十五日凌晨，邓兆祥一声令下，重庆号这艘吨位最大的国民党海军军舰驶出吴淞港；于二十六日六点安全抵达烟台解放区。邓兆祥和起义官兵，迅即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通电嘉奖！

董德兴对此评价到：这艘国民党最大军舰的起义，带动了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以及随后的一批军舰起义，极大地震撼了日暮途穷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就在重庆号巡洋舰投奔光明后不久，王亚文与周应聪加紧了和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的起义接洽工作。林遵，是民族英雄林则徐的侄孙；其父亲林朝曦曾供职于北洋海军、参加了甲午海战。由于祖辈的影响，青年时代的林遵就满怀振兴中国海军和雪耻甲午战败的豪情。他曾赴德国学习潜水艇技术，日本投降之后，他即率“太平”、“中业”两舰接收南沙群岛，并在主岛上立碑“太平岛”以宣示领土主权。

林遵同样痛恨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以及军内派系林立和排斥异己。早在抗战时期的重庆，林遵就和王亚文成为推心置腹的朋友、表达了向往光明和跟着共产党一起干的意愿。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狮强渡长江天堑；国民党军苦心经营的千里江防瞬间被多处突破。国民党海军垂死挣扎、准备与南京共存亡；此时，王亚文借用周应聪的专车急赴南京，代表党中央向林遵下达了立即率舰队起义的命令，同时要求他起义后设法找到解放军进攻南京先头部队的首长。在得到王亚文的具体指令之后，准备工作相当充分的林遵立即率领第二舰队三十余艘军舰，与四月二十三日在长江江面起义；并在陈修良即南京地下党的帮助下直接成功地接洽了解放军先头部队首长，坚决地粉碎了敌人固守南京的迷梦。在王亚文等同志的努力下，在上海解放前夕相继成功参与海军起义的共有七十多艘军舰。这些军舰和邓兆祥、林遵等将领，旋即成为人民海军初建的中坚力量。同时，王亚文还对国民党空军五十余架飞机起义发挥了积极作用。

五月，上海解放前夕；王亚文与张权拟定了上海武装起义周密计划，并得到了陈毅、刘伯承前敌指挥部的批准。按计划，届时张权将亲自率领一支部队，配合人民解放军强攻四川北路的敌警备司令部，然后直扑复兴岛，以期赢得上海的和平解放。起义时间定于五月十六日上午十点，前一天则是王亚文与张权的最后一次接头。但是上海国民党陆军部队阵地起义，由于一个中校军官的出卖而功亏一篑，张权不幸被捕。坚贞不屈的张权，二十一日以自己的壮烈牺牲，确保了所有参与起义者的安然无恙。此时，离上海解放只有六天。上海解放后，张权将军得到了隆重追悼、并最后安葬于龙华烈士陵园；他也是陈毅市长签发的第一号烈士证书的主人。半个世纪之后，王亚文置身龙华烈士陵园；与昔日战友重新相伴！